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路径研究

翟玉胜，孔祥莹

（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铜仁 554300）

摘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举措。数实融合能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催生新兴业态，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经济系统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省依托政策与资源优势，在数字基建与产业数字化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数字人才结构性短缺、传统企业转型滞缓、区域融合水平不均等现实挑战。未来，需从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基础设施、助推中小企业转型、构建数据安全与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系统施策，形成具有西部特色的数实融合路径，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关键词：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路径；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9－0074－06

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将数实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渗透研发、生产、流通全链条，重塑价值创造模式，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现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数实融合的机理。在要素层面，任保平和张公娇[1]指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与数字治理共同重构生产函数；在范式层面，钞小静等[2]强调其本质是“技术-经济范式”的系统性变迁，需同步推进数字经济实体化与实体经济数字化；在空间组织层面，夏杰长和陶鸠[3]提出数字技术打破地理集聚依赖，催生跨边界的“数字产业集群”。然而，郭克莎和杨倜龙[4]亦警示，当前融合仍面临数据要素应用基础薄弱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核心技术问题。大量实证研究印证了这种不均衡呈现出显著的“东部高地、西部洼地”空间格局。例如，高培培[5]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数实融合协调发展水平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级递减；王志平[6]的研究亦证实，数字经济的融合效应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的效应尚不显著。

既有研究多从全国宏观或理论范式层面展开，对于贵州这类具有“后发赶超”特点的西部省份，其数实融合的特殊路径、现实障碍与针对性策略尚缺乏系统探讨。作为国家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贵州自2016年起持续实施“大数据＋”战略，在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与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方面形成先发优势。2025年，贵州出台《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数据产业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版)》等政策，围绕产业培育、人才引育、数据供给等8大方面提出25条具体举措，致力于构建精准适配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生态。然而，与数字产业化成果相比，贵州产业数字化仍面临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转型乏力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不高。现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剖析其数实融合的现状、问题与路径。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①聚焦西部“后发赶超型”地区的独特情境，弥补现有研究在区域差异化路径方面的不足；②构建一个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产业-人才-治理”协同推进分析框架，为同类区域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融合范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指以数据为关

收稿日期：2025-12-01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5RW28)

作者简介：翟玉胜(1968—)，男，河北秦皇岛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财务金融；孔祥莹(1997—)，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规划。

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的深度嵌入,对实体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服务等环节进行系统性重构,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竞争力的过程。其本质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改造与重塑,而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或局部应用。本文中所指的"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非虚拟经济部门;"融合"则强调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在其中的渗透深度与价值创造效能。

1.1 数据与技术的双轮驱动:从"要素赋能"到"价值共创"

融合的底层逻辑始于生产要素的革新。数据作为具有非竞争性与可复用性的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具有或有性和场景依赖性,打破传统要素的稀缺约束,并通过"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形成对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乘数效应。而数字技术则作为价值转化载体,与数据共同构建"数据+算力+算法"的数字化生产力体系。刘尚希[7]强调,数据资本化触发底层经济逻辑的重构,推动经济逻辑从实体化、线性化向虚拟化、非线性化转变,这使得传统生产函数与边际收益规律发生变化: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边际收益可能递增。在这一机制下,数据与技术的协同不仅重塑实体经济的生产函数,还通过数据要素与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实现从"要素投入"到"创新溢出"的价值共创,为贵州在农业、工业等领域推进融合提供了底层动力,也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1.2 技术、产业与企业的递进融合:从"单向赋能"到"系统重构"

融合在中观层面呈现为技术→产业→企业的三级穿透式演进。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与产业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实现从"外部嫁接"到"内生耦合"的转变。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将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孪生-智能决策-动态优化"的闭环体系。在产业层面,融合体现为"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三链协同。纪玉俊和韦晨怡[8]提出,数实融合正推动产业集聚从地理集中向数字生态跃迁,并创新性地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复合三位一体模型,指出以产业数字化和空间数字化的互动为基础,数字化后的新产业和新空间重新聚合,形成更合意的产业集聚模式。进一步地,许军和李晓敏[9]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数实融合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节角色。在企业层面,融合推动组织形态与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再造。企业通过构建"敏捷组织+数字基座",将研发—生产—销售流程从"串联"重构为"并联",极大提升运营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这一递进过程,为分析贵州"万企融合"行动与产业数字化实践提供中观逻辑支撑。

1.3 基础设施、制度与创新协同:从"局部试点"到"系统治理"

融合的持续深化依赖于"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创新网络"三维支撑体系的协同共建。基础设施生态是融合的物理底座,以"东数西算"、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建为核心,着力打通数据流通的"最后一公里"。政策与治理生态重在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企业"的协同框架[7],通过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安全治理与收益分配等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数据要素活力。创新与安全生态则强调在开放协同中筑牢防线。洪银兴和任保平[10]指出数据要素的协同配置是驱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价值演进的根本动力;王恒旭等[11]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数字市场供给主体的涌现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重路径促进数实融合。因此,需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为融合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2 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现状分析

2.1 数字经济现状分析

2.1.1 产业规模高质量跃升

贵州省数字产业规模呈现阶梯式增长与结构优化并重的特征。2022 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7 879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 35.3%。2023 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进一步增长至 42%。至 2024 年,全省数字产业规模达2 549.4亿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1 138.8亿元,增长 24.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1 014.9亿元,增长 18.5%。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表明其增长动能持续增强。在结构上,传统业态逐步优化,人工智能、北斗应用、云计算等新兴赛道快速发展,累计培育 778 家成长型数字企业。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已集聚1 355家企业,包括 64 户华为云生态伙伴企业[12]。这一演进轨迹不仅体现产业规模的量级跃升,更彰显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2.1.2 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

贵州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绿色低碳智算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了从“数据存储”向“智能算力供给”的战略跃迁。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全省重点数据中心达48个，算力总规模达56.89 EFLOPS，其中智算占比和国产化率均超过90%，区域集中度（贵安）也超过90%，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密集、自主可控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网络传输能力取得显著突破，建成全球首条400 G全光网算力通道，稳步推进“东数西算”南部通道建设，为东西部协同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这些基础设施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与数字孪生等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从“基础资源”向“智能生产力”转化。

2.1.3 数据要素价值深度释放

贵州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领域率先探索，构建了“制度-市场-技术”三位一体的驱动机制。制度层面，颁布实施全国首部数据流通交易地方性法规，并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数据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机制，为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提供法治保障。市场层面，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交易活跃度居西部前列，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了百余个高价值数据产品。技术层面，综合运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可信数据空间，着力打造“数据可用不可见、模型可验不可拷”的安全流通环境，为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这些举措系统性地推动了数据从静态“资源”向可交易“要素”和可计量“资产”的跃迁。

2.1.4 市场环境系统性优化

贵州通过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市场主体培育、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等措施，系统性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在政策与服务方面，贵州着力优化数字生态，不断完善数据技术标准体系，累计发布各类标准510余项，并通过举办数博会等活动深化合作交流。人才引育方面，全省数字经济人才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达到45.32万人；贵州通过人社部门联合多部门印发《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任务清单》，并依托高校和企业共建产学研平台，推行“学习＋基地＋实践”的合作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市场主体培育上，贵州累计培育大量成长型数字企业，大数据领域投资超230亿元，有效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整体来看，贵州通过政策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培育与人才生态优化的系统集成，构建“政策—企业—人才”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环境，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市场支撑。

2.2 实体经济现状分析

2.2.1 传统产业基础与转型压力

贵州省实体经济以能源、烟酒、化工、特色农业及旅游业等传统产业为重要根基，其发展质态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的稳定与韧性。工业领域，规模以上传统企业数量庞大，但在生产模式、管理效率等方面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压力，整体自动化与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多数企业仍处于“机器换人”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全链条数字化能力。农业领域具有鲜明的山地特色，但受复杂地形制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难度大，机械化普及率较低，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挖掘不足，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渗透仍处于试点推广阶段。服务业领域虽在数字化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但传统商贸、旅游等业态仍占主导，其数字化转型受限于企业认知不足、资金投入有限等因素，整体进程相对滞缓。这一系列结构性特征与转型阻力，共同构成了贵州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独特且复杂的现实挑战，决定其转型进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2.2.2 新兴产业发展态势

着眼于培育新质生产力，贵州省积极布局和发展新兴动能，为实体经济结构升级注入新活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领，在有色、化工、酱酒等特色优势产业中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集群化发展态势，在贵阳大数据科创城等载体集聚下，形成覆盖基础软件、应用开发、信息安全等环节的产业梯队。在前沿领域，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在重点区域开展试点示范；平台经济依托网络货运、直播电商等特色模式实现规模化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不仅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更通过技术溢出和模式创新，正在重塑贵州实体经济的竞争格局与发展范式。

2.2.3 产业结构优化进展

贵州实体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系统性优化与能级提升的关键阶段。工业的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升，发展质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在产业空间布局上，通过打造白酒、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由分散布局向集聚高效发展转变，形成资源精深加工和新兴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协同的新格局。大数据和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已成为驱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方面，通过构建水、风、光、火多能互补的清

洁能源体系,在重点行业推广节能降碳技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2.2.4 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体系建设与技术创新能力成为推动贵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部分龙头企业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中取得突破。例如,贵州轮胎凭借全面深入的智能化改造入选全球“灯塔工厂”,形成可复制的标杆范式。产学研合作日益紧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结合更加深入。在部分特色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并参与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标志着产业竞争力正从传统的成本和资源优势,向技术、标准和品牌优势拓展。然而,整体来看,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仍是需要持续破解的课题。

2.3 数实融合现状分析

2.3.1 农业数字化转型

贵州省农业数字化转型正从单点技术应用迈向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对作物生长的精准感知与智能决策。在种植领域,物联网虫情监测、智能灌溉系统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养殖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样成效显著,环境智能调控、精准饲喂等系统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益与生物安全水平。数字技术还催生了“数字+生态+文化”等融合型业态,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这一系列变革标志着贵州农业正从传统经验依赖型向数据驱动型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3.2 工业智能化升级

贵州工业智能化升级以“万企融合”行动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转型。突出表现为生产模式的系统性重构,企业通过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实现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的并行化再造。在特色产业领域,智能化改造成效显著,部分企业通过建设智慧工厂、构建全流程溯源体系,实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双重提升。智能化升级还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企业从同质化竞争转向以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为核心的价值创造。这种由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的发展路径,为贵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3.3 服务业数字化创新

贵州省服务业数字化创新呈现出多元融合、业态迭代的活跃态势。以“AI+服务”、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模式快速发展,重塑传统服务业态。数字文旅领域通过构建线上平台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服务优化,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新格局。金融科技创新的深入推进,通过数字化信贷模式有效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在消费领域,网络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持续壮大,“线上引流+实体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与用户体验,还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方向升级。

2.3.4 治理数字化提升

贵州省治理数字化建设正从工具应用层面向体制机制创新深度拓展,着力构建数据驱动、业务协同的现代治理体系。通过推进“设施联通、数据融通、平台互通、业务贯通”的系统性工程,显著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智能政务平台的广泛应用,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极大改善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在基层治理领域,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实现了公共事务的快速响应与精准处置。治理数字化建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和提供高效公共服务,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市场条件。

3 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问题

3.1 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衡

贵州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城乡与区域间发展差距制约全域数字化协同发展。尽管已实现行政村通信网络全覆盖,但偏远山区受复杂地形制约,仍面临网络信号稳定性不足与传输速率受限等现实挑战。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体现在算力资源分布上,农村地区在数据中心布局、云计算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支撑智慧农业、远程医疗等现代化应用场景的规模化发展。这种基础设施的非均衡状态,不仅限制乡村地区对数字资源的可及性,更阻碍全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程。

3.2 数字技术应用深度不足

尽管贵州省在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规模上取得显著成就,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微观企业层面仍呈现浅层化、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格局。多数传统企业将数字技术视为局部优化工具,而非战略性重构要素,导致技术应用多停留在生产监控、线上销售等单个环节,缺乏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的系统性整合。这一现状与本土数字产业生态尚不成熟密切

相关：具备行业解决方案输出能力的服务商供给不足，适应不同行业特点的标准化应用体系尚未健全。同时，数据要素的价值挖掘不够深入，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机制有待完善，制约企业基于数据洞察进行创新决策的能力提升。

3.3 数字人才供给严重短缺

贵州省数字人才体系建设面临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双重挑战。高端研发人才，如算法工程师、架构师等因平台能级与科研集聚度不足而引进困难；同时，具备数字技能与行业知识的交叉型应用人才也显著短缺，导致企业在推进智能化改造时缺乏内生动力。基层数字技能人才的匮乏更为突出，尤其在中小企业与农村地区，设备运维、系统管理等基础岗位面临“无人可用”困境。这一状况与本地教育培训体系的供给滞后密切相关：高校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职业教育的实践培养资源不足，企业内训体系尚未完善，形成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系统性错配。此外，高端人才引进机制不健全、吸引力不足，导致省外高层次数字人才流入有限，进一步加剧人才供需矛盾。

3.4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多重障碍

贵州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认知、资金、技术、安全等多维因素制约。传统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认识不足，往往将之视为技术工具升级而非发展模式变革，导致顶层设计缺失与资源投入不足。资金压力尤为突出，转型所需的高额投入与长回报周期使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技术层面，既有信息系统形成的“数据孤岛”阻碍全流程数字化贯通，而适合区域产业特点的轻量化解决方案供给不足。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也成为企业重要顾虑，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的薄弱进一步加剧转型顾虑，形成“不敢转、不会转、不愿转”的复杂局面。

4 贵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对策建议

4.1 构建城乡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针对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衡的问题，贵州需着力构建城乡统筹、高效协同的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应持续推进“千兆黔省、万兆筑城”行动计划，强化农村及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质量，推动千兆光网和5G网络由“广泛覆盖”向“高质量连续覆盖”升级，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同时，应积极融入“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存算协同发展，构建通算、智算、超算和边缘计算协同发展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并建设高速直连网络以提升运力高效承载能力。此外，还需统筹推进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打通数据流通的关键环节。通过建立多元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坚实可靠的硬件支撑。

4.2 深化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应用

为解决数字技术应用深度不足的问题，需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全链条、多场景的深度融合。重点可依托“万企融合”大赋能行动，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数字工厂等创新应用，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行业级节点部署。应围绕贵州特色优势产业，如白酒、煤矿、化工、旅游及农业等，开放应用场景，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等技术的行业融合，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大模型应用高地。同时，建立“产业-高校-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机制，共建数字技术创新平台，提升本土数字技术供给能力与解决方案输出水平。还需通过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提供贷款贴息与风险补偿等方式，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转型成本，并鼓励开发轻量化、模块化的解决方案，以精准满足其转型需求。

4.3 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针对数字人才供给短缺问题，应加快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数字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开设紧密对接产业需求的数字技术专业，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可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计划，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设立“候鸟型”专家工作站等方式，柔性引进高层次数字人才，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架构等领域的研发与复合型人才。同时，实施数字黔匠培育计划，重点培养既懂大数据技术，又了解本地特色产业业务逻辑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激励与保障机制，在住房、子女教育、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为数实融合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4.4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要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入实施《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规范，为数据要素化提供

法治保障。积极培育壮大数据交易市场,推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创新发展,完善促进数据进场的政策措施。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鼓励打造高质量数据产品和服务。同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用规范,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等可信数据空间交易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高效配置,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入要素动能。

4.5 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与安全保障体系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安全顾虑,需要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与安全保障体系。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数据权属、使用边界与各方责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提升态势感知与应急处置能力。建立数字化转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为企业提供安全可信的转型环境。同时,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贵人智办”等数字治理平台功能,提升政府数字化监管与服务效能。通过建立包容审慎、敏捷高效的监管框架,在鼓励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任保平,张公娇.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5,41(3):30-45.

[2] 钞小静,王意萱,王宸威. 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再测算:来自融合深度的新发现[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5(2):12-21.

[3] 夏杰长,陶鸿. 数字产业集群创新与演化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25(1):3-14.

[4] 郭克莎,杨倜龙.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J]. 广东社会科学,2025(1):42-53,85.

[5] 高培培.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统计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24,40(5):28-32.

[6] 王志平. 数字经济及其融合效应对区域生产效率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2023,39(14):33-38.

[7] 刘尚希. 数字革命时代的竞争规则重构与治理创新[J]. 中国经济报告,2025(18):20-26.

[8] 纪玉俊,韦晨怡. 数实融合下的产业集聚数字化转型:动因、机理和路径[J]. 人文杂志,2025(5):42-52.

[9] 许军,李晓敏. 绿色科技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J]. 软科学,2026,40(1):20-27.

[10] 洪银兴,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23(2):5-16.

[11] 王恒旭,袁晓玲,赵锴. 数字市场供给主体涌现、政府协同与数实融合发展[J]. 软科学,2025,39(10):9-18.

[12] 数字贵州发展报告(2024)[N]. 贵州日报,2025-08-26.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n Guizhou

ZHAI Yusheng, KONG Xiang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is a core strategic measure for construct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lead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gital-real inte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dva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sophistication by reshap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purring new business formats, thereby injecting strong momentum into the economic system. As a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Guizhou Province, leveraging policy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has achieved phased result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However, it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structural shortages of digital talent, slow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and uneven regional integration levels. Moving forward, systematic measures are neede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ing robust data secur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to form a digital-real integration path with wester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sustained suppor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real economy; integration path; Guizhou Province